

经济学中青年学者丛书



江浙金融研究

姚会元 /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经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经济学中青年学者丛书

江浙金融财团研究

姚会元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浙金融财团研究/姚会元著.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财经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经济学中青年学者丛书)

ISBN 7-5005-3907-X

I. 江… II. 姚… III. ①金融-财团-经济史-江苏-近代 ②金融-财团-经济史-浙江-近代
IV. F8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83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e.go.cn.net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发行处电话:64033095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25 印张 288 000 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55 定价:24.50 元

ISBN 7-5005-3907-X/F·356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本书是“财政部部属院校财经专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之一。该专项资金由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联合出资设立，用于资助财政部部属院校财经专著的出版。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联合组成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资助选题计划的制定、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决策。管理委员会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杨天赐同志任主任委员，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王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孙伟生、苏金秀、余蔚平、张立宪、洪钢、贾杰等同志任委员。管理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负责资助出版项目的评估、审定和提出资助金额的意见，并为资助选题计划提供咨询。专家委员会由解学智教授任主任委员，杨天赐教授任副主任委员，王朝才、艾洪德、李俊生、余蔚平、张中华、罗林、秦荣生、聂培尧、夏大慰等同志任委员。设立“财政部部属院校财经专著出版专项资金”的目的，是鼓励财经理论研究，提高财政部部属院校的教学、科研水平，繁荣财经学术著作出版。由于受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水平和有关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可能还存在许多不足，对此，欢迎批评、指正。

财政部部属院校财经专著
出版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序

一个重要而又常被忽视的问题	(1)
(一) 一个问题	(1)
(二) 常被忽视的问题	(5)
(三) 金融资产阶级及其典型形态	(6)

第 一 编

一、江浙财团崛起的舞台——上海	(15)
(一) 上海地利,得天独厚	(15)
(二) 鸦片战争后经济地位迅速上升	(16)
(三) 渐成远东金融中心	(18)
(四) 奥秘所在	(27)
二、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	
础	(33)
(一) 一只控制上海的“手”	(33)
(二) 近代金融资本——江浙金融财团的经济基	
础	(38)
(三) “宁波帮”——江浙金融财团的社会基础	(49)
(四)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	(53)

三、商业银行的崛起与集中

-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之一…………… (59)
- (一)江浙金融财团的出现并非偶然…………… (59)
- (二)商业银行联合的产物:“南三行”、“北四行”… (66)
- (三)银行间相互兼职、人事渗透与相互投资…………… (70)
- (四)红火的钱庄资本…………… (73)

四、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

-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之二…………… (83)
- (一)民国初年,中国银行业发展状况及特点…………… (83)
- (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 (87)
- (三)透过“要求”所看到的…………… (96)

五、人才璀璨 群星灿烂

-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之三…………… (100)
- (一)江浙金融代表性人物…………… (100)
- 头面人物虞洽卿…………… (101)
- 钱业领袖秦润卿…………… (103)
- 襄助革命的沈缙云、朱葆三…………… (105)
- 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 (108)
- 学者银行家徐新六…………… (110)
- 银行家钱新之…………… (111)
- 核心人物张嘉璈…………… (112)
- 金融强人陈光甫…………… (113)
- (二)江浙优秀银行家的共同特点…………… (115)
- (三)江浙优秀银行家的历史作用…………… (119)
-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部分精英人物籍贯、
 学历、任职情况表…………… (120)

六、江浙金融财团的性质…………… (124)

第 二 编

七、左手乎？右手乎？

——江浙金融财团政治参预与掌权意识的实践 …… (129)

- (一) 蒋介石与江浙金融财团、上海黑社会势力的
历史渊源 …… (129)
- (二)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的左手 …… (134)
- (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的右手 …… (138)
- (四) 支持政变，是江浙金融财团企图分润政权
的政治实践 …… (145)

八、南京政府财政的有力支柱 …… (150)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150)
- (二) “内债”支撑着“内战” …… (150)
- (三) 巨额公债的推销 …… (157)
 - 民众自愿认购 …… (157)
 - 银行认购承购 …… (158)
 - 钱庄投资公债 …… (165)
- (四) 江浙金融财团投资公债的历史作用 …… (166)

九、江浙金融财团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又要好、又要恼 …… (171)

- (一) 永远结束了的 1927 年以前的那种自由
发展期 …… (171)
- (二) 宋子文，江浙金融财团的“朋友”和代言人 …… (175)
- (三) 经济上继续支持蒋介石及南京政府 …… (182)
- (四) 南京政府控制商界 …… (188)
- (五) 孔祥熙将工商业的不满引向江浙银行家 …… (194)

十、南京政府实现对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及钱庄

的控制·····	(200)
(一)江浙金融家们忧惧的中央银行·····	(200)
(二)从金融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中国、交通 两大银行·····	(202)
(三)中国银行成为宋子文向经济领域扩张的 有力工具·····	(210)
(四)拴住“三条小猪”等商业银行·····	(210)
(五)控制、垄断金融业的三点直接后果·····	(216)
(六)钱庄的衰落·····	(219)
十一、江浙金融财团被肢解及银行家以个人的资历和 声望在金融改革中的奔走·····	(227)
(一)财团独立地位的结束·····	(227)
(二)白银风潮·····	(229)
(三)杨格、李滋·罗斯在法币改革中·····	(230)
(四)江浙银行家在币制改革中的奔走·····	(233)
十二、30年代前期中国银行业的相对发展·····	(239)
(一)六类银行都有发展·····	(240)
(二)银行业管理趋于法制化·····	(243)
(三)发展的原因·····	(245)
十三、通货膨胀中的江浙银行家·····	(250)
(一)搞通货膨胀,南京政府便丧尽人心·····	(250)
(二)从“大牛二头”到“五分之一根油条”·····	(252)
(三)银行家们转移“通膨”损害,减少“通膨” 损失·····	(255)
十四、江浙金融财团与杜月笙·····	(260)
(一)上海“三大亨”中的后来居上者·····	(260)
(二)奇怪的银行家·····	(264)

(三)上海金融界的门神	(268)
十五、抗战时期江浙金融财团的个别败类	(275)
(一)公开投敌的唐寿民、叶扶霄	(275)
(二)资助周佛海	(278)
(三)做过伪上海市长的银行家	(278)
十六、张嘉璈与中央银行	(282)
(一)中央银行,孔祥熙的私人地盘	(282)
(二)黄金风潮与张嘉璈就任中央银行总裁	(285)
(三)张嘉璈力挽金融的最后努力	(286)

第 三 编

十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旅行社	(293)
(一)创办“旅行部”	(293)
(二)从旅行部到中国旅行社	(296)
(三)中国旅行社的经营	(298)
(四)创办中国旅行社的作用	(301)
十八、江浙金融财团丰富、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	(304)
(一)重视保持银行的普通商业性质	(305)
(二)注意保证股东利润,努力做好所有权、 经营权分离以及董事会与总经理协调	(308)
(三)视信誉为生命,有很强的服务意识	(309)
(四)上海银行的十条服务规则	(310)
(五)商业银行的私有性使人有“银行家即银行”的印象, 利用这一心态,银行家们总是想方设法凭自己的 言行为银行树立良好形象	(312)
(六)注重社会经济的调查与研究	(314)
(七)经营管理上“锱铢必较”	(316)

(八)不固步自封,注意向外(包括国外)学习先进的 管理经验	(317)
(九)眼光较远,胸怀较宽,着眼于未来	(318)
(十)注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	(318)
(十一)搞好人事管理	(321)
(十二)案例:金城银行的经营管理	(325)
十九、江浙金融财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	(333)
(一)支持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	(333)
(二)关注农村经济,开展农业贷款	(349)
(三)江浙金融财团对工矿业的放款原则	(352)
(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353)
二十、站在新中国大门口的江浙银行家	(363)
(一)面临历史抉择关头	(363)
(二)多数银行家的选择	(365)
后记	(379)

序

一个重要而又常被忽视的问题

(一) 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它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终寝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它虽在中国漫长历史上寿命短暂，只匆匆存在80年左右，但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它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阶段，作为一个阶级它是被消灭了，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

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经历过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工业革命，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独立发展阶段。它在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生长和活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决定它既不像英国、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有叱咤风云的历史，即通过

资产阶级大革命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跃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又不像某些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那样懦弱颓唐，任人宰割；它既不像日本资产阶级那样实行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使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像俄国资产阶级那样，与无产阶级对抗到底，成为社会主义的绊脚石，落得被镇压或逃亡域外的下场。中国资产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始终没有能够真正掌握过国家领导权，但它却一直设想着按照自己的蓝图改造中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既然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它的认识正确与否，就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成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并实行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中国的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待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不全面到全面、由不完全切合实际到渐切实际的过程。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和主办《湘江评论》期间，他曾将资本家看做恶魔一类，大声疾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¹⁾1920年后，毛泽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逐渐接近科学、接近实际。在1925年12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对中国革命具一种矛盾态度：当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和赞成革命；当感觉到革命对于其欲达大资产阶级地位有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们“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²⁾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

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他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³⁾他还设想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⁴⁾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在旧中国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⁵⁾他甚至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⁶⁾1948年3月，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人民大众的范畴包括了“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⁷⁾“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运动，而在1927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对于这个阶级，“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

取一律保护的政策。”⁽⁸⁾在常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在毛泽东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确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其结果是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积累资金、沟通城乡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做出的多而深的系统研究，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3年以后，由于共产党内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情绪滋长，未能坚持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 and 立场，在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政策与实践上都出现了偏差。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使资产阶级最后孤立起来，便于最后消灭资本主义。”他这时已认为：“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件事上要“良心少一点好”。其结果是，到1956年3月末就在全中国主要城市和集镇超前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这样急、这样快、这样彻底地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人及毛泽东本人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探索、论述、设想和所采取的政策。这就不能不犯脱离中国生产力水平、搞单一公有制于经济发展不利的重大错误，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实际上，在当时的

中国，真正够格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很多的，那些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被当作资本主义消灭的，有相当多一部分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属于劳动人民经济范畴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有益的个体手工业或个体商业。这些错误在中国后来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得到了纠正。

（二）常被忽视的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左”的路线干扰下，不可能科学、正确、客观地进行研究和评价。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实事求是的探讨、争鸣，客观科学的研究和评价被形而上学的粗暴批判与责骂所取代，尤其是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对中国资产阶级简单骂倒，将其看做是中国一切罪恶之渊薮，全盘否定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甚至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骂为‘牛鬼蛇神’”。⁽⁹⁾二是，这一问题被弄成了令人心有余悸、人们不肯轻易涉足的“禁区”。其结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成为被人有意或无意冷落的问题，至今，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一些重要问题仍未得到深透的研究。

但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毕竟是无法回避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伴随着步履蹒跚的中国近代化过程而产生，在凄风苦雨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壮大。她曾是旧民主革命的积极领导者；新民主革命时期，她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始终是共产党团结、争取、保护的對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民族资产阶级，有关中国的近代化历史过程，中国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等重大问题也就无法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意义于此，那末，对中国资本主义

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便不应再被忽视。

(三) 金融资产阶级及其典型形态

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很多，但解剖麻雀式是一重要方法，要在详细准确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对其不同派别、不同阶层、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逐一开展研究，以求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面貌、性质、历史地位及作用。

金融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部分，⁽¹⁰⁾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又是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最为成熟的典型形态——我谓之江浙金融财团。本书之所以选择江浙金融财团做为研究课题，其一是因为作者早已怀有强烈的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与探索做些力所能及工作的想法。其二是通过全面探讨和了解江浙金融财团，以历史启迪现实。“江浙金融财团研究”是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个空白项目，近年来虽有零星研究成果见诸有关刊物，但未见整体性研究成果问世。对于江浙金融财团已有的粗略的、传统看法是：“1927年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后又依靠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来获取暴利。”（《辞海》语）其实，对于江浙金融财团的评价不可以如此简单，江浙金融财团的活动也决不止此。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广泛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除了体现其阶级利益要求的政治活动外，江浙金融财团的经济活动对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不同寻常的巨大作用，并以自己雄厚的实力立足于上海，向全国辐射。有鉴于此，江浙金融财团的研究必定有历史对现实的启迪作用，益于人们正确了解认识今日金融及金融企业集团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其三，江浙金融财团20世纪前半期所走的路，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走的路，因此，这一课题

的研究，有利于人们从历史的实证方面认识和评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寻求、奋斗、挫折，从而正确认识新中国史前国情。

旧中国有所谓“华北”、“华南”、“华西”、“江浙财团”四大财团。华北财团是指操纵华北金融的银行资本集团，该财团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地区的官办、商办银行。官办银行中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北京分行、天津分行等，商办银行则以“北四行”为主体。“北四行”的4家银行大都创建于1915—1921年间，创立初期各行有各行的靠山，主要股东也不完全相同，有时彼此间还存在业务与利益上的冲突。1922年后，四行逐步联合，组织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设立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通过这种行业内的联合形式，四行扩大了实力，增强了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提高了对华北地区的金融把持力度。到1927年时，四行钞币发行额达到1700万元之多，约占全国发钞总额的1/10，之后，最高时曾达到7000万元。1923—1936年，四行吸收的储蓄总额达到9000万元。1927年四行放款高达1750万元。⁽¹¹⁾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开始之后，华北财团随着京津地区重要银行南迁上海、江浙以及“北四行”与“南三行”的融合，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无法与“江浙金融财团”平起平坐。

所谓华南财团主要是指设立并活动于广州、香港的广东省办银行及其他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等。这批银行中较为重要的有侨资工商银行、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华商银行、国民商业储蓄5家银行。工商银行设立于1918年，成立之初，该行实际上是作为孙中山先生联络华侨的机关。资本仅25万元（5万股，每股港币5元），⁽¹²⁾主要投资入股者为北美留学生、华侨及港、沪两地的同盟会员。1919年春，该行业务向北扩张，由薛仙舟、陈建初、蔡增基等人在汉口设立分行，1922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